

1246.7-387C1



《人民文学》
1984年
短篇小说选
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编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《人民文学》
1984年
短篇小说选
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编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《人民文学》1984年短篇小说选
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编

责任编辑：曾果伟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制

*

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20,000 印张：15.5 印数：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68 定价：(平装)2.05元 (简易精装)2.25元

目 录

- 战友朱彤心 邓友梅(1)
惊涛及续篇 陈世旭(21)
她一双眼睛不说话 林 希(75)
小厂来了个大学生 陈 冲(91)
大公鸡悲喜剧 谌 容(127)
危楼记事 李国文(142)
魂归何处 石 言(188)
野狼出没的山谷 王凤麟(230)
花豆 高行健(260)
冒顶 孙少山(289)
矮凳桥传奇 林斤澜(319)
门铃 陆文夫(344)
挂匾 张一弓(359)
又是桃李花开时 何士光(385)
白色鸟 何立伟(406)
树桩 阿 城(413)

眩目的海区	吕雷	(420)
条件成熟以后	茹志鹃	(456)
海边的雪	张炜	(470)

战友朱彤心

邓友梅

朱彤心虽然有点怪癖，可人缘不错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算起来他也不过二十来岁，可给我的印象已经很老了。他又瘦又高，走起道来左右晃荡，戴的那副深度近视镜只有一条腿，另一条腿用纳鞋底的线绳拴着。他从不用药，哪儿破了或是长疖子长疮，一律抹牙膏。他从不洗衣服，每过一些日子，就把军装脱下来按在煤油里泡一泡，然后晾干，说是“这比你们洗的干净，不仅不招虱子，什么菌也不招”。于是他的军装胸前、袖口和领边都闪耀着铁甲般的光辉，散发着真正“德士古”煤油的气味。用煤油泡衣服，是他的特权。他是“灯光组长”，管着两盏煤气灯和一桶煤油。“灯光组长”是兼职，他的正职是创作组员。他一直在写，但写出来的剧本从来没演出过，游击环境中，没有报刊杂志可以登载，剧本若不能演，就算白写了。创作组长是位女同志，有点母性的慈悲心肠，见别人睡了之后他还守着如豆的油灯，蹲在老百姓锅台上边写，写出来的作品又一本本的送进锅台下边去烧，实在太残忍。组长就和队长商量，每逢他写出新作后，让他在行军出发前，或是驻军闲暇时向全队朗读一遍，算作口头

“发表”。他对这种发表方法，极为重视。每次朗读前都特意洗洗脸，还在他的日本水壶里灌一壶热水，每念完一场戏都往嘴里挤一点牙膏，用水送下去。他相信这能保持嗓音清亮。同志们也很欢迎他朗读作品，看成是一场娱乐。他的作品虽然没法公演，读起来却常有惊人之笔。他有回写了个快板剧，内容是抓特务，说两个农民自卫队员刨白薯，忽然从地里刨出个特务来（我已忘了那特务是怎么钻到地下去的了。只记得他是在地下靠吃白薯过日子）。特务想反抗，两个自卫队员就一人一句的唱快板：“我的刀儿闪闪亮，我的枪口放银光。你要还是不投降，坚决把你毙来枪，毙来枪那个毙来枪，哐来令哐一令哐！”大家问他什么是“毙来枪”？他说：“白话就是枪毙。”

朱彤心的兼职工作倒是干得十分出色，两个汽灯六个纱罩和他形影不离。汽灯和他那“铁甲”发出的气味，会熏得同班的人睡不着觉，他因此常常单独一人住在老乡的牛棚上层（苏北有些地方牛棚和猪圈是二层小楼，楼下养猪养牛，楼上放杂物）。队长叫通讯员小江给他当灯光助手。这小江莽里莽撞，打气时碰坏一个纱罩。从此他就再不许小江给灯打气。有次朱彤心在一出戏里演个日本太君，正演到太君向汉奸队长布置机密任务，台上的汽灯忽然冒起了红火苗。小江心想救场如救火，不顾他的禁令，搬个椅子上台来打气。“日本太君”一见马上摆摆手说：“你的不要，开路开路！”他解下洋刀，自己上了椅子，对汉奸队长说：“你的扶着椅子！”他打完气，把椅子拉开，挂上洋刀又接着往下演戏。演汉奸的队员笑得答不上话来，朱彤心却小声说：“工作时间，你严肃一

点好不?”

一九四三年冬天，我们住在苏北一个水网地区的小村里，半夜突然来了敌人。大家睡得懵里懵懂爬起来就跑。人们去牛棚上通知朱彤心，那里只有汽灯却没有人。敌人已进了村子，既不能大声喊又不能仔细找，只好抱着汽灯先跑出去。我那年十二岁，本来就跑不动，有个熟识的侦察员又送给我一双日本军队的大皮鞋。那鞋比我的脚要大个一寸多。也许那时就有了崇洋的思想萌芽吧，我穿着它心里美得不行。组长说了我几次，我也没舍得脱下来。这下子糟了。跑起来不光沉得要命，而且带子总开，一开了就绊脚，跑个三、二十步就停下结一回鞋带。那地方沟岔多、树木密，三结两结，我看不到前边人的影子了。先还听得见脚步声，顺脚步声去追却总被河沟挡住去路。最后干脆转了向，转来转去总离不开一条深沟的堤岸边。我精疲力竭，浑身是汗，只好顺堤岸溜到沟里去。坐在沟底连歇气带辨别方向，顺便哭一场。后来有些年，我也想哭过，可怎么挤眼也掉不出泪来了，才体会到能痛快的哭也是一种享受。

我正在享受哭的乐趣，听到了脚步声，赶紧收拾起眼泪，想观察一下来的是什么人。就听劈里扑鲁一阵响，从堤上跌下一个人来。我拔腿就跑，沟里的冰冻得还不厚，我那皮鞋底子又硬，一踩上去马上“咔嚓”一声，就是一个水洼。我连着跑几步，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响了几声，两只脚就全湿透了，冰水扎得我脚生疼。

那跌翻在地的人说话了：“小邓，你别害怕，我是朱彤心。”

我停住脚，问他：“刚才人们找你，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他说他铺床时把稻穗错当稻草铺在身下了。那楼板矮，又有缝，底下的牛总伸头去拽稻穗，还用舌头舔他的脚。他睡不着，半夜搬到后院草棚里去睡，所以别人没找到他。他被尿憋醒，出去撒尿，听见前街上有人说话，有马喷鼻，说的不是中国话，知道来了鬼子。他去找汽灯，见汽灯已不在了，这才翻后墙跑了出来。可跑得急，把眼镜忘在草棚里了，一路上不是撞在树上就是跌进沟里，这已是第三回进沟。他问我队伍上哪儿去了？我说：“我要知道早就走了，还会在这儿蹲着吗？”他说：“不要紧，咱先看看情况再行动。瞎跑不行，弄不好反会钻进敌人窝里去！”

我俩在沟里坐了一会儿，天麻花亮了，他说：“需要看看村里动静，要是敌人走了，我得回去找眼镜去。”

这沟的堤岸很高，一个人站起来刚到半腰上。他叫我站到他肩上去看。我因为鞋里进了水，这时脱下鞋把脚塞在棉帽子里捂着。这脚一踩上他肩膀，被北风一吹，先就打个寒战。另外，我心里多少也有点害怕。既怕他把我摔下来，又怕敌人看见给我一枪。匆忙看了一眼就赶紧说：“看不见什么，太远了，”就跳下来了。他不死心又叫我扶着墙，他站在我肩膀上去看。我扶墙站好，他一踩上我的肩膀，就压得我浑身直晃。我说：“不行，我挺不住。”他就双手扒住沟沿，两脚悬空又看了足有一分钟，这才松手跳下来。

我问他看见什么了？

他说：“他妈的，没眼镜我啥也看不见。”

这话刚说完，沟岸上有了沙沙的响声。朱彤心抓住我的手，注意听了听说：“不好，有人向我们接近，快走！”

我拎起皮鞋要走，沟上边有人说话了：“别跑，跑也来不及了。”

我俩赶紧贴着沟边卧倒。朱彤心大声问：“什么人？不报番号我开枪了！”

沟上的人说：“要是敌人，早把你那架眼镜的家伙敲掉了！别吓唬人，我知道你没枪！”

来的是通讯员小江。

小江是队长派来联络我们的。队伍已经向海边转移了，叫他找到我们后，马上去海边一个村子找他们，那里距离这儿有四十几里地。

这小江是个漂亮角色。不论环境多艰苦，他的军风纪总是整整齐齐，军装洗得干干净净。现在他还是头紧脚紧，帽子上挂着副战场上捡来的破风镜，小背包打得方方正正，二指宽的背包带把红军被分成了九个一般大小的方块，中间两个方块中勒着一双黑布面千层底的新鞋。鞋底朝外，为的是放下背包当坐物时，不致脏了被子。

既有了前进目标，就赶紧出发吧。我那双皮鞋却已经冻得梆梆硬，跟朱彤心的棉袄一个颜色了。把脚塞进去，就象塞进两只罐头盒里，又冷又硬，还拖拖拉拉叮叮当当乱响。

朱彤心对小江说：“你把背包上的鞋子解下来，给他穿吧！”

小江把眼睛睁得溜圆说：“噢，讲得轻巧，吃根灯草！这双鞋人家给我三发六五子弹我都没舍得换呢。”

朱彤心说：“不就是一双布鞋吗？再发鞋我还你一双。”

“布鞋？”小江转个身把背包扭向一边，使鞋离朱彤心远

一些，“这是直贡呢面子！”

朱彤心说：“那你也给他！”

小江说：“你发什么命令？你又不是我的班长！他走不动我们两人扶他好了！鞋子不能给！”

他们俩就架着我，拖着我走。走了里把路，我的脚磨破了，他俩也冒汗了，都想休息一会。

我们靠一个坟头坐下。朱彤心忽然说：“现在脱离了部队单独行动，我们得有个班长才行。有个班长才算有组织！”

小江说：“队长不在这里，谁能任命？”

朱彤心说：“没人任命我们选一个！”

小江说：“能选自己不能？”

朱彤心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小江说：“那我选我自己当班长！”

朱彤心说：“我也选我自己！”

我说：“我选朱彤心！”

小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噘起了嘴。

朱彤心说：“好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我当班长了。现在我就下命令，战士小江，你把背包上的鞋子给小邓穿！”

小江嘟嘟囔囔地说他军阀主义，可还是无可奈何地把鞋拉了出来，扔给了我。我把布鞋换上，就把皮鞋丢在地上了。

鞋也穿好了，他们也歇够了。朱彤心命令继续前进。小江问我：“大皮鞋你不要了？”

我说：“这一辈子再不穿那败家货了！”

他说：“那我捡着它好了！满好一双皮鞋，要叫鬼子捡去，

白便宜了他！”

这次回去，朱彤心对小江解除了禁令，不仅允许他给汽灯打气，还教会他点灯，最后竟把灯光组长的重任交给了小江，自己专门从事写作去了。但他保留了一项权力，每到清除剩油时，他还要去泡一次衣服，条件是演出时他给小江当助手。

那时候，我们那个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还不会说“深入生活”这个词。大家都管下部队采访叫作“搜集材料”。朱彤心头一次采访是在“宿北战役”中到俘虏收容站帮忙。那个收容站在我军第一线部队后边三里处，只有两个保卫干事看着三百多俘虏，临时隐蔽，准备天一黑，敌机一回巢就把俘虏押送到后方去。可天黑之前，敌人一支骑兵突围出水了，冲过我们防线直奔俘虏营而来。俘虏们一见他们的人来了，就立刻群起鼓噪，随着骑兵逃跑。两个保卫干事有枪，一面还击一面后撤，逃了出来。回来就报告说：作家叫敌人抓去了。这事传到宣传队，大家很不安。有人担心朱彤心会牺牲，也有人怕他失节。队长和组长大姐甚至为他有两三天脸色阴郁，既不说笑也不打扑克。谁知过了半个月，我们正行军时，忽然看见朱彤心在路旁一块石头上坐着，手里在耍一根唱京戏的马鞭。大家围了上去，问长问短。他笑嘻嘻敬个礼，拿出一封证明信交给队长说：“谁带干粮了，给我一块。我在这等你们等了半夜，饿草鸡了。”

据他说，敌人出水时，他还在忙着给俘虏发给养。两个人管三百多俘虏根本管不过来。天冷，俘虏们身上衣裳薄，就三一群俩一伙钻到老乡的草垛里、牛棚中、犄角旮旯里取

暖。他发给养得到处找人。俘虏里有个人是随军剧团唱戏的，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孩，皮带上别着个马鞭。他挺可怜那个小孩，发给养时没见到这两人，就端着几个高粱饼子到处找，终于发现他们躲在一个空白薯窖里。他把饼子送下了地窖，除他俩之外，地窖里还有四五个俘虏，也没领到吃食，看见饼子就上来抢。他把那几个人喝退了。他答应出去再替他们找找。他从白薯窖出来，出水的敌人已到了村头，大批的俘虏正乱喊着，要随骑兵一块逃走。有两个广西兵到地窖来招呼他们的老乡，冷不丁看见他冒出来，就扑上来把他按倒，用绑腿绑了，重把他推下白薯窖，并和他一起下到地窖里。

绑他的广西兵喊：“弟兄们，咱们的马队冲出来了，快跟着他们逃吧！”

地窖里的人站了起来，争着往外爬。

朱彤心问：“这算怎么回事？”

绑他的人说：“怎么回事？你当了我们的俘虏了。”

朱彤心说：“你当我们的俘虏，我们是怎么待你的？忘恩负义！”

唱戏的就对广西兵说：“这位弟兄待咱不错，把他放了吧！”

广西兵说：“放开他，他可得跟咱走！”

唱戏的对朱彤心说：“你就答应跟我们走吧。”

朱彤心说：“你刚从枪子儿底下逃出条命来，还上哪儿去？你就不心疼孩子？你们那骑兵是自己逃命的，不是来接你们的，你两条腿跟得上它四条腿吗！我们的队伍正追击，追不上他们还追不上你们？安生呆这儿吃饼子吧！”

那唱戏的一听，果然坐了下来。另外几个人也犹疑了。

那俩广西兵一看这情形，骂了句“孬熊”，扔下朱彤心，急忙钻出了白薯窖。唱戏的就给朱彤心解了绑。朱彤心松松胳膊扭扭脖子说：“既这样，你们等着，我还给你们找吃的去。”

唱戏的说：“现在还乱着，等一会再出去吧。”

另几个人也劝他稍等一会。果然，没出十分钟，上边又来人了。而且是直冲白薯窖来的。人们就叫朱彤心躲到他们身后去。来的还是刚才那两个广西兵。他们一下来就问：“刚才那个新四军呢？”

唱戏的说：“你们跑你们的吧，还找人家干什么？他已经走了。”

广西兵说：“不是，骑兵队丢那妈跑出三里地去了，我俩追不上。求他别记前仇，还留我们当他的俘虏得了。”

朱彤心从人背后转出来，说：“我对你俩宽大处理了，坐下吧。不信你等着看，跑出去的那些人都还得抓回来。”

果然不到半夜，就又回来了四、五十人。朱彤心给他们编上队，趁夜就领着往后方带。可他不知道该送到哪里去。路上碰见一个战斗连队，他要交给人家，人家不要；但见他一个人赤手空拳领着六、七十俘虏不象回事儿，派了半个班帮他押送。他们转了一整天，碰上了友邻部队的战俘收容站，又央求人家留下这批俘虏。人家说：“我们人手不够，要留得连你一块留，把俘虏押到大后方你再归队！”他被迫当了十几天的收容队长，一直到了沂蒙山里，才请收容站的同志给他开了个证明信，拿着归来。临走他用半斤黄烟换来了俘虏的那根马鞭，他认为队里演出会有用处。

大家要给他报功。他很懊恼，说是“净跟这些龟孙惹麻烦了，没顾上搜集材料。把创作计划白瞎了。”

这件事之后不久，他入了党。第二年春天打莱芜，他又下去搜集材料。他随着突击队冲进城里，后续部队被敌人封锁住没跟上来，突击队在敌人内外夹击中伤亡很大。打到天亮，只好退到城角一个破庙里隐蔽。这时连指导员也牺牲了。突击队长是个排长，对朱彤心说：“这里就你一个穿吊兜军装。没说的，你当政治队长吧！”他问：“这合规定吗？”排长说：“我还没入党，总不能叫我当指导员不是？”朱彤心说：“行，可我不会指挥打仗。”排长说：“战斗我指挥，你做政治鼓动工作。记住，冲锋时你得跑在前边，喊：‘同志们跟我来’，这就行了！”朱彤心说：“这我能喊。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冲呀！”排长说：“我紧跟在你后边，叫你往哪头冲，你就往哪儿带就完了。”

他们在城里隐蔽了一天。外边的人听见城里没了枪声，以为他们全完了。不料天黑后发动总攻，外边一拉响炸药，他们就从破庙里接应了出来，四处呐喊，八面放枪。敌人以为我军已全进了城，军心动摇，就把城门放开了。这一仗打完，部队给他披红挂彩，举着立功喜报把他送回了宣传队。他埋头苦写，用二十天写出个剧本。队长觉得这个剧本不演太不象话了，就下狠心排演了它。彩排的那天，连宣传部长也来看。这个戏实在远不如他以前朗读的作品有趣。头一场写蒋介石和汤恩伯开会，两人没完没了的发表反共演说；第二场写我军指挥部开会，军长作了个完整的动员报告；第三场写战斗开始，干部战士一个个表决心；第四场写攻城，两边的军队反复冲过来打过去。人们耐着性子往下看，表情

却十分严肃。只有他自己，看得眉开眼笑，又点头又咂嘴，还不断对坐在身边的创作组长作提示：“这里我是说明我们战士的政治觉悟的……这表明我军勇敢精神……你听，一句话就把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揭出来了……下一场还精彩！”

这出戏一共演出了两场，干部战士们都说一看就打瞌睡，只好收起来。这时，打莱芜的那个部队来信商量，想调他去正式担任连指导员。宣传队领导也认为他去那里会更好地发挥他的才能，便找他谈话，问他本人愿不愿意，并说明，他现在是排级，如去任职，可以破格提拔为正连级。朱彤心请求让他考虑考虑。回到班里就蒙上被子睡了下去，一连两顿开饭都没去吃饭。组长以为他病了，做了病号饭送来。他把碗推开说：“你别假关心了。你们商量好把我推出艺术界，那么狠心，还给我送病号饭呢！”组长这才知道是闹情绪，马上汇报给队长。队长来找他谈话说：“我是征求你的意见，并不是命令你走。你不愿去，不去就完了，要什么性子！”朱彤心说：“我不去。我知道你们心里看不起我，认为我没有艺术天才。等着吧，我非作个样儿给你们瞧瞧！我要求给我时间再下去搜集搜集材料。”

他就背起背包又到独立师去了。

这独立师原是河南部队，一九四五年夏天参加中原突围来到华东。他去的时候，这部队刚接到密令，要他们出击到敌人后方，把战线扩大到蒋管区去。朱彤心就跟着去了敌后，没了消息。过了一年，我们打到河南，与独立师会师了，我们去找他却没找到。师首长告诉我们：刚从沂蒙山打出来不几天，朱彤心就叫敌人飞机打伤了腿。当时部队正被十几倍

的敌人追击堵截，情况紧急，无法带重伤员走。只好给他二十块银元，把他交给了沿途一个村里的老百姓埋伏起来。结果，我们前脚走，追击的敌人后脚就到。蒋管区的群众条件不同于根据地，估计他是牺牲了。师首长说：“当时的敌情老朱全知道，可这个同志很有党性。组织和他谈过话，他十分镇定，既没哭天抹泪，也没有提什么要求。他只说：请组织上放心，我决不做叛徒，给我留下颗手榴弹吧。”

许多人听了都掉了泪。有人提议给他开个追悼会。队长说，并没确实牺牲的消息，追悼会是开不得的。

过了两年，宣传队在六合地区等待渡江的时候，朱彤心突然穿了身地方干部的制服，骑了匹马，还带了个警卫员，顺着江边威风凛凛地跑来了。看到我们在树下排腰鼓，他老远就跳下马，大声喊道：“奶奶的，到处打听你们驻地，我骑着马整走了一天！”

排演自然停下来了。大家围上去抱他、揍他，摘下他的帽子来往天上扔，七嘴八舌问他怎么还没死。队长拉着他上部队去，那警卫员牵马上来问：“县长，这马卸不卸？”他说：“送马号去说我骑来的，叫老刘帮着喂上，咱今天不回去了。”大家听了目瞪口呆，怀疑刚才是否听真切了！组长结结巴巴地问他说：“刚才叫你什么？什么长？”

“县长，临时的！”朱彤心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找到你们了，我就要回来了。爱什么长什么长，叫别人干去吧，我还是写我的剧本。”

这晚上大家在竹林下开了欢迎会，要他报告这两年战斗经过。他说部队把他留在老乡家，当天晚上敌人就来了。可